



法兰西战略文化

French Strategic Culture

冯 亮 /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法兰西战略文化

French Strategic Culture

冯 亮 /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法兰西战略文化/冯亮著.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 11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ISBN 978 - 7 - 5097 - 5451 - 1

I. ①法… II. ①冯… III. ①外交战略 - 研究 - 法国 - 现代
IV. ①D856. 5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303353 号

·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
法兰西战略文化



著 者 / 冯 亮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赵怀英

责任编辑 / 赵怀英 仇 扬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全球与地区问题出版中心 (010) 59367004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90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7 字 数: 268 千字

版 次 /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5451 - 1

定 价 / 7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序 言

作为世界大国之一的法国有着独特、悠久、充满人文与历史智慧的战略文化，法兰西战略文化既塑造了法国的软实力、强化了法国的硬实力，也深刻影响了冷战后历届法国政府的战略选择和国家行为，甚至在某种意义上造就了今天法国的国际地位。

与物质主义或曰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包括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等理论——不同的是，当代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充分重视文化、观念、历史、认同等理念性要素在国际行为体的战略选择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在对战争与和平、武力与策略等严肃、冰冷而又是国际关系理论永恒主题的剖析研究中，赋予国家以“人性”。在建构主义国际关系学者看来，不同的战略文化决定了不同国家对国际关系主题的认识，塑造了不同国家的身份认同和战略偏好，进而对国家间不同的战略选择即国家的战略行为构成重大影响。

本书从战略文化视角对冷战后从密特朗到萨科齐时代法国政府的对外战略进行全面深入的考察，试图论证影响法国政府战略行为的最重要因素是以大国地位为指归的法兰西战略文化。

作者认为，法兰西战略文化是基于法国独特的地缘战略位置和法兰西人文历史传统，经过长期发展逐渐形成的一整套战略观念，其基本要素包括：追求大国地位、坚持独立自主、善用均势手段。冷战后戴高乐主义的出现，意味着这一战略文化的成型。法兰西战略文化在冷战后历届法国政府中得到了传承和内化，对法国冷战后对外战略的制定和实践产生了稳定、长期、重大的影响。正是在这样一种战略文化的塑造性影响下，法国

在冷战后及时调整其对外战略，在国际战略环境发生剧变后，依然以二等强国的物质实力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着重要大国的角色，对推动世界多极化发挥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

欧洲一体化政策是法国对外政策的核心，也是冷战后法国政府为维护其大国地位优先考虑、着力做出调整的最重要对外政策；与美国的关系是法国对外关系的关键领域，法国围绕着重返北约军事一体化等问题在冷战后做出了对美政策的重大调整，但仍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以彰显自己的大国身份；非洲一直被法国视为其战略势力范围，巩固和加强法国在非洲的军事、经济、文化存在是法国增强其全球影响力的重要环节。本书围绕冷战后法国外交的上述三大领域，分别阐述了法兰西战略文化对其产生的重大影响。

法国“独立、有效、够用”的核威慑力量是法国保持独立自主大国地位的关键依托，书中考察了法国核战略的起源及其传统，从战略文化角度分析了法国冷战后对其核战略进行较大幅度调整的深层原因。与常规武装力量相比，核力量发展周期更长、建设维护成本更高、使用可能性更小，法国在自身物质实力相对下降的情况下依然竭力维护其“足够、有效”的核战略，不仅是针对可能对法国安全构成现实威胁的国际恐怖组织和“流氓国家”，根本的原因在于其认为独立自主的核威慑力量是大国力量的重要表征、在大国关系中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法国深厚的人文历史传统是法国软实力的核心内容。本书研究了法国文化外交传统及其在冷战后的延续和发展，讨论了法兰西战略文化对法国文化外交的影响与作用。在冷战后国际关系中软实力影响不断上升的环境下，法国利用自身文化优势扩大影响力、争夺话语权，文化外交和软实力成为法国维护大国地位的有力支柱。

法兰西战略文化对法国“持二等船票坐头等舱”所起到的作用值得我们深思。中国的和平崛起既需要强大的经济军事等物质条件作为坚实支撑，也亟须制定完整、理性、符合时代与现实要求的国家大战略。对中国战略文化的全面梳理对国家大战略的形成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是真正意义上的顶层设计，上通千年青史，前指神州未来，事关国运兴衰。作者期待国内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能从法国的经验中得到一定的借鉴和启发。

目 录

第一章 战略文化：理论与源流	001
第一节 理念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与战略文化范式	001
第二节 法兰西战略文化：定义和要素	013
第三节 关于法国外交和战略研究的文献综述	017
第四节 研究方法和全书结构	024
第二章 攀登众山之巅的法兰西	029
第一节 为什么是法国：法兰西如此与众不同	029
第二节 戴高乐的法国：战争、希望，以及文化	050
第三节 冷战后的法国：理念的內化与传承	065
第三章 法兰西战略文化与冷战后法国外交政策	080
第一节 冷战后的国际战略格局与欧洲形势	080
第二节 均势理念与冷战后法国欧洲一体化战略	083
第三节 坚持独立自主与冷战后法国对美战略调整	103
第四节 软实力扩张与法国对非洲战略	122

第四章 法兰西战略文化与冷战后法国核安全战略	142
第一节 法国核战略起源及其传统.....	143
第二节 冷战后法国核战略的发展和调整.....	156
第三节 法兰西战略文化的影响与作用.....	167
第五章 法兰西战略文化与冷战后法国的文化外交	175
第一节 文化特征与软实力.....	175
第二节 法国文化外交传统与法兰西战略文化.....	185
第三节 冷战后法国文化外交.....	194
第四节 法兰西战略文化对文化外交的影响.....	201
第六章 历史远未终结	211
第一节 法国在今天世界舞台上的地位.....	211
第二节 文化、战略文化与国家利益和行为.....	230
第三节 全球化世界的明天.....	233
参考文献	249
后 记	260

第一章

战略文化：理论与源流

自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美国著名学者杰克·斯奈德（Jack Snyder）将文化因素引入战略研究并提出“战略文化（strategic culture）”这一重要概念^①以来，从战略文化的视角观察和研究国际问题日渐成为国际关系学界一个崭新的分析范式，受到了学者们的高度重视。研究解析一个国家的战略文化，并从这个视角去分析这个国家的外交和安全战略，为更加深入、全面、准确地探寻国家的战略偏好（strategic preferences）和战略选择，为分析研究国家的战略利益和行为提供了重要的分析框架和理论工具。

第一节 理念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与战略文化范式

对国家的身份、利益进行文化角度的分析并进而研究文化与国家行为的互动关系是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前沿之一。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学界开始感兴趣于使用文化、战略文化和其他一些理念性概念对国家行为作出解释。“文明冲突论”让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声名鹊起。这一论断在被提出时，以及在 2001 年“9·11”事件后之所以能引起巨大反响，原因在于它回应了新千年到来之际西方世界普遍感到的焦虑：害怕“成功国家”的竞争（亚洲）和“失败国家”的仇恨（整个阿拉伯－穆斯林世界）。

^① Jack Snyder, *The Soviet Strategic Culture: Implications for Limited Nuclear Operations*, Santa Monica: RAND, 1977, p. 8.

法国著名学者蒙布里亚尔认为，一旦意识形态试图将文化中一切旨在打破过于僵化的框架的努力套上桎梏，这种意识形态就成为病态现象，有时甚至非常可怕。“法国大革命以及随后的欧洲革命导致了各种民族主义及其衍生现象，影响远远超过勒南（Renan）所说的共同生活意愿（vouloir vivre ensemble）。这种衍生现象之一就是希特勒的狂热极端民族国家主义。”蒙布里亚尔称，“意识形态会传染，19世纪的极端民族主义，及其由此带来的修昔底德式的‘仇恨和恐惧’，是造成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最根本原因”。^①

新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把国际关系中纷繁复杂异常凌乱的各种因素和行为现象高度抽象化而建立了高度概括简约的结构主义理论。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认可新现实主义对国际体系无政府特性的认定，并与其同样假定施动者具有先验给定的身份和利益。这两种国际关系的主流理论都被称为理性主义理论，它们把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体系看作自助体系，借鉴经典经济学的分析视角把国际社会看作市场，把国家和其他国际行为体看作市场中的“公司”，从而认定在国际体系的结构作用下，每个行为体天生具有利己主义特征和理性特征，在给定的变量作用下，每个国家都将出于“自助”目的而发生同样的行为。正是从这一点出发，理性主义理论，尤其是结构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国际关系理论必须是体系层次的理论，而研究作为结构体系内互动单元的国家或国际行为体的理论都是“还原主义理论”。在理性主义的理论架构下，国家是“去人性化”“非人化”的行为体。主流理性主义理论——新现实主义理论和新自由主义理论从而都是物质主义的理论。

温特的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则强调观念、认同和文化的作用。温特的理论一方面认为权力政治和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是由国家建构的，行为体包括其身份和利益则是由国际结构文化建构而成，从而对不同国家行为体是否在国际无政府结构的制约下只会采取同一种行为的理论提出了根本质疑。同时，另一方面，温特的理论鼓励和促进了国际关系理论对身份和利益关系的研究，即行为体的利益取决于行为体身份，而行为体利益则

^① 蒙布里亚尔：《行动与世界体系》，庄晨燕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第42页。

影响行为体的行为。温特评论说,“乔治和基欧汉 (George and Keohane) 指出了三种国家利益——生存、独立、经济财富。他们习惯地把这些利益称之为‘生命、自由、财产’。我要再加上第四种利益,即‘集体自尊’(self-esteem)。这些利益的形式因国家其他身份而异,但是,所有国家的根本需求是一样的。如果国家要再造自我,就必须考虑这种需求”。^①

我们可以简单地理解为,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给了国际体系结构中的各个国家以“人性”。温特不否认把国家当作真实的、单一的行为体的做法是合理的,认为这样的国家才可能被赋予意图特征,但温特认为“提倡这种做法的学者忽视了这样的合理性,往往把国家施动当作无可置疑的给定因素,从而招致持怀疑态度的批评者对此提出疑问”。温特的建构主义理论框架把国家定义为具有主权和在其领土内使用暴力的垄断权的组织行为体,国家形式是在国家与其统治的社会之间的关系中建构起来的,又是通过政治权威结构对社会施行统治的。温特建构主义理论的突出贡献在于,它说明了国家是怎样由内部结构建构的,这些内部结构把国家的集体观念和使其成员的集体行为制度化并得以认可的规则结合起来。温特说,“个体主义者要使我们相信,国家的任何属性都不是由国际体系建构的,整体主义则要使我们相信国家的一切属性都是由国际体系建构的。介于两者之间的某一点才是真实的表述”。^② 秦亚青教授对此认为,国际关系的研究议程应该包含人性的内容,尤其是人的社会性。建构主义重新开始质疑被国际关系主流理论视为给定的一系列重要概念,如国家,提出并解答“我是谁、他谁”这样一些基本哲学本体论问题,力图使人性回归国际政治,使人的能动性、社会性和实践性体现出来,因此也使政治的本意体现了出来。^③

温特认为,国家在内部结构建构、与其他国家的互动(主体间互动)、与国际体系结构的互动中形成了自己的身份和利益。这样的身份和

① 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第294页。

② 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第306页。

③ 秦亚青:《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译序,同上,第31页。

利益不是先验给定不变的，而是由文化建构的，并且是进化的。国家利益被温特定义为“生存、独立、经济财富和集体自尊四种客观利益”。^① 同时温特认为，国家身份形成的主导逻辑不是自然选择，而是文化选择。他认为，“身份是由模仿和社会习得建构起来的，建构主义强调身份和利益的造就和再造。按照建构主义的看法，一个完全内化文化的标志是行为体与这个文化的认同并把这个文化以及一般化的他者作为对自我悟知的一部分”。^② 在温特的建构主义理论看来，国际关系中的文化是指不同行为体经过互动社会化而习得并共同拥有的国际规范、制度和规则。换言之，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层面的文化是指社会建构的共有知识，即集体观念，这种行为体之间共有的和相互关联的知识，包括信念和意愿。这些重要的理论探索为后来的战略文化学者提供了重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

1977年9月，斯奈德在为兰德公司提供的一份题为《苏联的战略文化：有限核作战的含义》的研究报告中，将政治学领域的政治文化概念运用于国际政治研究领域，从而首先引出了战略文化这一概念，并将其定义为“国家战略决策者通过传授或模仿而获取并彼此分享的关于核战略的观念、情感上的条件反射和习惯性行为模式的总合”（Sum of total of ideas, conditioned emotional response and pattern of habitual behaviour that members of national strategic community have acquired）。斯奈德认为，将苏联人的战略思维方式视为一种独特的“战略文化”可以解释苏联为什么倾向于单边而不是合作式的摧毁限制战略，美苏两国战略文化的差异导致了他们对待有限核战争的不同态度。^③

英国学者科林·格雷（Colin S. Gray）指出，战略文化提供理解国家行为的背景，并不解释行为的原因。战略可以包括很多方面，其中有一个方面就是文化的。文化是指有着一定独特历史经历的某一特定安全共同体所具有的、持续存在和社会传播的观念、态度、传统、思维习惯和优先行

① 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第303页。

② 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第422～423页。

③ Jack Snyder, *The Soviet Strategic Culture: Implications for Limited Nuclear Operations*, Santa Monica: RAND, 1977.

为方式。某一特定的共同体可能具有不止一种战略文化，就像针对特定的任务或地理环境会有多种军事文化一样。例如，美国战略文化中就包含着一些明显对立的倾向，它们是两种极端，但是都属于“美国的风格”。战略文化与国家行为之间并不是一对一的关系。文化只是塑造战略制订的过程和影响战略的实施，并不一定实际选择与某些抽象的或理想化的文化偏好之间的关系有多么密切。一个安全共同体的实际行为可能与其主导战略文化暗示的战略偏好完全相反。比如，在一战中，英国作为一个海上战略文化国家，却被迫发挥了一个陆上大国的作用。再如，根据美国的战略文化，本来是不允许发动像越南战争那样一场不能取胜的战争的，但是越南战争却成为美国在二战后卷入时间最长的一次战争。^①

哈佛大学教授江忆恩认为，西方的战略文化研究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② 第一阶段为 70 年代末至 80 年代初的所谓“决定论”时期。在这一时期，西方战略文化研究的重点是解释美苏两国核战略不同的原因，认为战略文化是固定不变的，是美苏两国不同战略选择的决定性因素。例如格雷（Colin Gray）曾认为，美国的历史经验影响着其对于武力的思维和行为模式，促使主导其战略选择的一套独特信仰的产生，而这一信仰又导致形成了美国独特的核战略。第二阶段为 80 年代中期至 80 年代末的所谓“工具论”时期。在这一时期，西方战略文化研究有了深入发展，研究的触角伸向了国家内部的战略决策，认为战略文化是战略决策领域政治主导权拥有者手中的工具。例如克莱因（Bradley S. Klein）就认为，美国对外所宣称的战略，实质上是政治精英们为了使他们实际施行的战略被接受和消除潜在政治挑战力量的工具。第三阶段为 90 年代以来的所谓“干预变量”时期，即认为战略文化既不是决定因素，也不是工具，而是一种干预变量。在这一时期，战略文化研究侧重于“利益决定论”所无法解释的战略选择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避免了第一阶段的决定

① Colin S. Gray, "Strategic culture as context,"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5, 1999, pp. 49-51. Colin S. Gray, "National Style in Strategy: The American Exampl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6, No. 2, 1981.

② Alastair Iain Johnston, "Thinking about Strategic Cultur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4, Spring 1995. pp. 32-64.

论，认为战略文化是可以变化的。例如，“干预变量论”主要代表列格罗（Jeffrey W. Legro）就认为，由于战略文化根植于最近的经验，而不是历史，因此战略文化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可以变化的。二是注重理论的检验以及与不同理论的对比。例如，列格罗检验了现实主义、制度主义与组织文化论对制约战争的解释。另一“干预变量论”代表人物科尔（Kier）则将结构现实主义、官僚组织理论与战略文化论进行了对比。

以彼得·卡赞斯坦为首的学者们在1996年出版的一本集体著作《国家安全的文化：国际政治中的规范与认同》^①进一步确认“战略文化”的内容，把行为规范与国家认同视为影响战略决策的决定性变量。该书通过大量的案例研究，探讨了两方面主题：第一个方面是探讨战略决策中的文化、制度背景，其中涉及对各种行为规范的讨论。第二个方面则集中讨论国家、种族的认同对战略决策的影响。该书认为，规范是在群体生活中产生的行为准则或风俗习惯。其作用也有两种：其一，规范可以建构一个国家新的认同。其二，规范也能进一步确定一个已经存在的国家认同。该书另一个主题是对认同的有关研究，视“认同”为国家建构中的主要变量，进而认为各个国家、民族之间的关系就是此种认同的确立过程中造成的现象。事实上，该书的作者们普遍地认为“文化”既是一套评价标准（evaluative standard），也是一种认知准则（cognitive standard），而不同种类的“规范”以及“认同”就是在这个广义的文化平台上运作，其存在决定了各个国家、群体该在何种制度下生存、社会制度怎样运作、如何规范与其他群体的关系，等等。根据他们的观点，规范与认同实际上限制了决策者可运用的手段，战略决策不可能脱离文化体系而存在，“战略文化”应该被确立为研究国防决策、战争战略的主要方向。

斯奈德提出战略文化的概念早于温特建构主义的理论，但正是建构主义给予了战略文化概念以全新的理论生命，使之成为一种研究国际问题的重要范式。斯奈德之后，随着国际关系学界的理论创新，尤其是建构主义的兴起，“战略文化”的内涵和外延有了很大发展，这一研究思路被其他

^① Peter J. Katzenstein (ed.),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学者们所继承和发展，成为战略研究领域一个十分重要的议题。

比如上文提到的哈佛大学教授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他把战略文化定义为“一个完整的符号系统，它通过形成关于军事力量在国际政治事务中的作用和效率的概念，建立起普遍、持久的战略偏好”。江忆恩认为，作为一个“符号系统”，战略文化包括两部分内涵：一是关于战略环境的规律性的一组假定，即战争在人类事务中的作用（战争是偏离常规的还是不可避免的），对手及其造成的威胁的性质（零和还是非零和），使用武力的效用（控制结果和消除威胁的能力以及在什么条件下使用武力有用），这些构成战略文化的核心范式；二是与核心范式有着密切逻辑联系的可操作层次上的一组假定，即关于如何应对上述战略环境的、经过等级排序的一组战略偏好（a limited, ranked set of grand-strategic preferences）。江忆恩战略文化理论的核心观点是，不同的战略文化决定了不同国家对于战争与和平、冲突与合作等国际关系主题的认识，塑造了不同国家的身份认同和战略偏好，进而决定了国家之间不同的战略选择，也就是国家的战略行为。^① 江忆恩的理论得到了包括秦亚青教授等在内的很多中外学者的认同。

事实上，西方学者对战略文化的研究无论在本体论还是方法论方面都有着很大分歧，对战略文化概念的界定和定义也各自不同。仅从国际关系学理论谱系的角度看，提出战略文化概念的斯奈德教授是一位现实主义者，其名著《帝国的迷思》被认为是防御性现实主义的代表作之一，^② 而江忆恩则是建构主义学派的重量级代表人物。对战略文化是一种常量还是变量，它能够阐释国家行为体的行为原因还是仅提供行为背景的争论尤其严重，并由此产生了第一代和第三代战略文化学者间的论战。从此产生的这些学理分歧一方面导致人们对战略文化的定义、概念及其运用方法产生很大歧义，另一方面也拓展了人们的思路，从而使运用战略文化范式和理

① Alastair Iain Johnston, *Cultural Realism: 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3; Alastair Iain Johnston, "Thinking about Strategic Cultur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4, Spring 1995, p. 32.

② 参见于铁军《帝国的迷思》译序“大国过度扩张的国内政治机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论架构开展国际战略问题和安全问题分析研究的视野变得更为宽广——要知道，国际关系理论本身就是在争论中前行发展的。一个新的理论，围绕其开展的论战越多、学术纷争越激烈、争论者的学理层次越高，则越证明这个理论富有魅力、位于前沿，且拥有未来。

中国学者对战略文化的研究开始于军事战略研究领域，从李际均将军在1997年《中国军事科学》杂志上发表《论战略文化》一文起，迄今仅有17年的时间。李晓燕博士在其论文中总结了我国学者战略文化研究的特点：一是对“战略文化”概念的界定尚无统一意见；二是在军事战略和国际关系两个不同的学术领域展开研究且呈现出不同的特色；三是对西方战略文化研究的引介相对较多，对战略文化本身的基础性理论研究较少。我国学者普遍认为，战略文化与一国文化的一致是必然的、毋庸置疑的；战略文化对国家行为具有至关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简言之，有什么样的文化，就会有什么样的战略文化；有什么样的战略文化，必然有与之相符合的国家行为。^①

李际均在《论战略文化》一文中指出，“思想文化与战略相结合，我们可以称之为战略文化。战略文化是在一定的历史和民族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所形成的战略思想和战略理论，并以这种思想和理论指导战略行动和影响社会文化与思潮。……它是制定现实战略的潜在意识和历史文化情结，因为战略家只能在特定的历史文化环境中进行认识和实践创造活动。……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战略文化都有其传统文化的烙印。也就是说，战略的底蕴和根基是思想文化，而且战略思想最终要汇入到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思想文化的发展历史中去”。^②

李际均对战略文化的定义及其基本观点得到了很多中国学者，尤其是军事战略学者的认同，在他们看来，“战略文化是指影响和制约国家或民族战略行为的思想和文化因素，它是国家或民族的传统文化在战略领域里的反映，是制定战略的思想文化脉络，对战略行为具有深远的影响”。“战略文化从属于一国大文化的范畴，是大文化中最富活力的成分。……不同文

① 李晓燕：《战略文化与主导文化的一致性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外交学院，2007，第9页。

② 李际均：《论战略文化》，《中国军事科学》1997年第1期。

化传承往往会产生不同的战略文化，而这些战略文化进而导致决策者在决策问题上的不同认知的形成，从而在国家发展的战略上，对于目标的优先次序、目标与手段间的关系问题产生出不同的判断，并最终形成各具特色的国家战略选择。”基于这种观点对中国战略文化的研究也无一例外地认为，中国的战略文化与文化表现出完全一致的性质和特征。“中国的战略文化植根于中国古典文化，深受传统哲学思想与战略思维的影响，是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与战略思维相结合的产物。”“中华民族是一个战略思维十分活跃而成熟的民族。在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战略思想的宝藏。战略文化作为一种亚文化，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条重要的支脉、一个重要的源头，并且是其极具华彩和魅力的组成部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决定了中华民族战略文化的特色。中国发达的战略文化又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乃至整个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①

军事战略领域另外一些学者对战略文化的研究明显受到西方研究的影响，侧重于从微观层面界定战略文化的含义，在观点上有对西方研究的明显借鉴与融会。宫玉振把战略文化定义为“国家在运用战略手段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持久性的、相对稳定的价值取向与习惯性的行为模式”。并且认为，“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念，作为文化传统的组成部分，战略文化传统的基本性格必然要受到所属文化传统的主导性价值观念的渗透与影响。战略文化传统的价值体系的核心，也往往是由其文化传统的主导性价值观念构成的”。周丕启也是从抽象层面定义战略文化，认为“战略文化实质上是战略决策者在决定以军事力量来实现国家政治目标过程中所共有的习惯性行为模式和价值观”。张晓军和许嘉从文化的含义入手界定战略文化的含义，并且融会了中西学者的观点，认为战略文化“是指由战略符号系统载荷的社会信息”。它包括两个组成部分：“一部分是与冲突性质、暴力使用、安全内涵、敌人和威胁性质相关的对

① 江新风：《日本战略思维探究》，《中国军事科学》2004年第4期，第137页。张露、王迎晖：《论当代中国大战略选择的和平性——一种基于战略文化的考量》，《太平洋学报》2005年第6期，第24页。王幸生：《中华民族的战略文化传统及其特色》，《中国军事科学》1998年第3期，第58页。